

日本战略地位、走向与中日新型关系的构建

中日关系研究课题组

内容提要：北京 APEC 会议后，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但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应客观评估日本的综合实力，理性判断日本战略走向。本文认为，日本仍然是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国。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与“普通国家”化步伐加快，中日竞争与摩擦上升，但受国内外环境的制约，安倍政权难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背景下，中日两国在新地区架构内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摆脱安全困境、加强合作符合双方的战略目标，中国应该推动构建中日新型关系。

关键词：中日关系 战略地位 日本 新型关系

2014年11月北京 APEC 会议前夕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中日关系开始有所缓和。从积极因素看，双方政府部门的对话和高层往来逐步恢复。2015年3月14日，中国民政部长在日本仙台参加联合国世界减灾大会期间与日本外相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2012年9月日本“购岛”事件以来中国部长级官员首次访日，也被视作落实“四点共识”的一环。¹ 3月19日，第十三次副部级中日安全对话时隔四年在东京举行，双方就尽快启动“海上联络机

本文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课题之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张沅生（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于铁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初晓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华（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主任编辑）、符晓（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

1 《外媒：中日两国部长举行会谈 同意加强防灾减灾合作》，新华网，2015年3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16/c_127585403.htm，2015年4月2日登录。

制”交换了意见。3月23日，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了日本执政党代表团，并表示“中日关系正在恢复改善”，日方则认为“去年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为两国关系改善打下了基础”。¹ 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雅加达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指出中日双方要彼此奉行积极的政策，加强对话沟通，增信释疑，努力将此前双方达成的“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² 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又接见了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二阶俊博率领的3000人访华团，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³ 7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首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这是两国加强高层战略沟通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积累共识，管控分歧，形成中日关系稳定向好的势头。⁴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依然严峻，双边关系困难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首先，围绕战后70周年的首相谈话是否要写入“侵略”和“道歉”等关键字眼的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国内仍在辩论。2015年3月26日，安倍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表示中日关系在APEC会议后有了较大改善，但对中国的军费开支增长十分担忧，并表示要联合美国和东盟国家敦促中国改变海上行为，期间还发表慰安妇乃是“受人贩子之害”的荒唐言论。⁵ 其次，日本扩军态势出现强化势头。3月23日，安倍在国会回答有关自卫队训练的质询时，将自卫队称作“我军”。3月25日正式服役的“出云”号“护卫舰”堪比意大利等国的航母，尽管拥有攻击型武器并不符合日本的宪法。⁶ 7月16日，安倍利用自民党控制的众院，强行表决通过安保相关法案，扩大自卫队在海外的军事活动。⁷ 再次，在经济关系上，日本疏离中国的趋势仍在继续。一方面，对华投资和贸易额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在对待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问题上日本疑虑重重，紧跟美国指责AIIB的治理结构和融资标准，并于5月21日提出

1 《俞正声会见日本执政党代表团》，新华网，2015年3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3/c_1114735076.htm，2015年4月2日登录。

2 《习近平在雅加达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新网，2015年4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4-22/7226822.shtml>，2015年7月1日登录。

3 《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5年5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3/c_1115384356.htm，2015年7月1日登录。

4 《首次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在北京举行 杨洁篪同谷内正太郎共同主持》，新华网，2015年7月17日，http://japan.xinhuanet.com/2015-07/17/c_134419867.htm，2015年7月26日登录。

5 David Ignatius, "David Ignatius's Full Interview with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6, 201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post-partisan/wp/2015/03/26/david-ignatiuss-full-interview-with-japanese-prime-minister-shinzo-abe/>, 2015-04-02.

6 《安倍称自卫队为“我军”是口误还是蓄意》，载《中国青年报》，转自新华网，2015年4月1日，http://japan.xinhuanet.com/2015-04/01/c_134114899.htm，2015年4月2日登录。

7 《日本众院强行通过安保法案》，新华网，2015年7月16日，http://xuan.news.cn/cloudnews/wyxxh/20150716/2477933_c.html，2015年7月26日登录。

1100亿美元的亚行贷款扩容方案，专门用于建设亚洲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复次，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仍在下滑。据日本内阁府2014年12月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调查于当年10月进行），对华好感度达到历史最低点14.8%，比2013年下跌了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29岁年龄段的好感度从2013年的33%下降至2014年的25.7%，在各年龄段跌幅最大。¹

中国国内在如何判断日本的战略地位、战略走向以及构建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架构方面仍存在多种迥然不同的声音。

中日两国是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国家，中日走向对抗冲突还是走向互利共赢，对于我国能否保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and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对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未来是否和平繁荣，都具有重大影响。虽然中日关系近来有所改善，但中国国内在如何判断日本的战略地位、战略走向以及构建中日关系发展的基本架构方面仍存在多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本文拟结合中国对日政策的战略目标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如何认识日本的战略地位

尽管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历史上长期往来，但互相之间的认识仍然有较大偏差。目前，中国对日政策严重缺乏共识，舆论宣传受民族主义影响很大，也带有较强的情绪化色彩。其中，尤以两种观点影响颇大。

第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实力与战略地位已明显下降，日本不再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不必担心中日关系长期紧张乃至恶化，当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超过日本时，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这种观点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将国家安全的立足点几乎完全放在实力对比上，认为实力强的国家更加安全。第二，认为中日之间的问题完全是由实力对比造成的。毫无疑问，增强综合国力有助于提升我国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也的确证明了实力弱小的国家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近代日本的崛起以及发动的两场对华战争，某种程度上确是在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这种观点同时也具有很危险的一面。在国际关系中对国家实力进行比较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不同的学说流派，在哪些因素构成国家实力方面存在很不同的看法。比如，现实主义通常认为军事力量是决定性的，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强调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则认为国家身份认同、国际社会接受度对一国实力有很重要的影响。一旦对国家实力判断有误，并进而冒险采取行动，很可能走向悲惨的结局。正如战争研究权威学者布莱内说的，“战争通

¹ 内阁府、『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2014年12月22日），<http://survey.gov-online.go.jp/index-gai.html>，2015年4月2日登录。

常在两国就其力量对比看法不一致的情况下开始，在交战国就其力量对比看法一致的情况下结束”。¹ 因此，综合地、全面地判断中日实力至为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就是从错误估算实力走向战争一败涂地乃至社稷倾覆的一个典型例子。冷战结束后，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单纯提高硬实力并不完全能够应对各项挑战。此外，就理论而言，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讨论，譬如，实力强的国家是否一定是最安全的？国家实力与国家的安全是否是一种线性关系？目前，对这些问题还难以给出确切的结论。

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曾两次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一次是通过甲午战争，葬送了晚清洋务运动的成果；另一次是通过20世纪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再一次阻止了中国现代化前进的脚步。这是一个不容小觑、须全力以赴认真对待的国家。20世纪前半期，日本穷兵黩武，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自己也最终落了个战败投降、本土被美军占领的下场。

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下致力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8年，其经济总量即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综合国力远远落后于日本。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以购买力平价衡量，198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68.6%。² 同样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1980年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30%，日本占世界比重为7.8%，人均GDP中国只有日本的3.5%。³ 当时，美国和日本是中国争取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实行改革开放的两个重要国家。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政策。

此后的30多年里，两国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日本经济停滞不前，而中国经济却加速发展。201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加上日元大幅度贬值的因素，2013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达到9.5万亿美元，而日本为4.9万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近两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么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16.2万亿美元，日本为4.7万亿美元，中国是日本的3.7倍。依照IMF的预测值，以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衡量，2014年日本经济总量占中国的比重分别为46%和27%。在此情况下，国内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在中日竞争中，中国可以凭借自己不断增长的国力拖垮和压服对方。

但事实上，日本综合国力仍然强大。日本迄今仍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13

1 [澳] 杰弗里·布莱内：《战争的原因》，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9页。

2 [英]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3 数据来自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14年版，<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4/02/weodata/index.aspx>，2015年4月2日登录。

年军费开支排名世界第五（如果按现值美元计算则居第七位），¹ 其科技水平、民生与社会建设、环境保护、国际竞争力、国际形象等许多重要指标目前仍名列世界前茅，有些还远排在中国前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申请的专利数达到25539件（占全球11.9%），名列第三，而日本为42459件（19.8%），名列全球第二。² 2010—2015年中日两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女性/男性）分别为76.6/74岁和86.9/80岁。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比例，中国为22.5%（2011年），而日本高达68.6%。³ 在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2013年中国列第91位，日本列第17位，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⁴ 依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9月发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在全球144个国家中排第28位，日本则是第6位。⁵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9月完成的一份名为“亚洲国家如何看待彼此”的调查显示，亚洲11国中除了中韩两国不待见日本外，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以及安倍首相均持有较高的评价，尤其是泰国、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中国评价也高，但不如对日本的评价，而对中国的评价高于日本的只有巴基斯坦、韩国和孟加拉国等三国。⁶

在看待中日经济实力时，还要注意流量和存量、“国内总产值”（GDP）和“国民总产值”（GNP）的区别。当我们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时，往往是指某一年在国内生产的增加值总额超过日本，并非指历年积累的财富总量超过日本。而且，GDP并不代表所有本国居民在这一年生产的增加值。计算一国的财富，还应该包括在海外的由本国居民控制的资产。发生危机时，这部分资产会极大地影响本国的经济面。比如，2011年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在海外的公司回流了大量资本，对日本经济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公司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存量远大于中国。按流量计算，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但是按流出的存量计算，2013年中国不到6200亿美元，只占日本的61.8%。⁷

1 参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库，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milex_database，2015年4月2日登录。

2 WIPO, “Who Filed the Most PCI Patent Applications in 2014?” March 19, 2015, <http://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2015年4月2日登录。

3 数据源于联合国，参考 <https://data.un.org/Default.aspx>，2015年4月2日登录。

4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Sustaining Human Progress, Reducing Vulnerabilities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New York: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4, pp.160-161.

5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Geneva: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4, pp.154, 226.

6 “Chapter 4: How Asians View Each Other,” July 14, 2014,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14/chapter-4-how-asians-view-each-other/>, 2015-04-02.

7 数据来源于 UNCTAD 网站。

中日力量对比的两大基础是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尽管中国自从2010年起GDP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但是在质量和人均方面,日本仍占明显优势。在经济实力上,如果从动态发展看,中国经济迈入经济增速下行的“新常态”,国内各种不稳定因素上升,中央提出“四个全面”,“保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日本经济发展虽长期停滞,却一直保持了社会稳定,目前亦开始进行以“安倍经济学”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走向仍然存在某些变数。在军事实力方面,军费开支占比并不是衡量国家间军力差距的最佳指标,日本军费开支绝对值长期占据世界前三位,多年累积下来的结果是,日本在反潜、防空等领域仍占有优势。在中国军力日益增长和两国军费差距不断扩大的形势下(目前中国军费已约为日本的三倍),日本正在调整军事战略,增加军费(日本军费在连续10年下降后于2013年起开始增加),大力加强防卫力量建设。此外,日本完全具有发展核武的能力。

即便中日双方绝对力量对比继续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考察力量对比也还须考虑其他变量。第一,美日同盟进一步强化。日本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日本,宣布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防卫范畴。2015年是战后70周年,4月底安倍访美在美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此前的日本首相只是在参议院或众议院发表演讲。日美还公布了第三个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军事合作方面力度明显加大。第二,日本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其他盟国的双边合作加深。2014年7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9月,日澳双方就加快缔结日澳军事合作新协定达成一致,日本将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技术。此外,日本显著加强了援助越南、菲律宾的态势,并特别增加对军事相关设施的支持力度,包括提供海事巡逻艇、协助举行海军演习等。¹第三,日本与俄罗斯关系的走向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尽管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加强了对俄制裁,但日本从未放弃利用国际形势转变改善对俄关系的努力。第四,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走势。中国在海洋政策上的举措,已经使国际社会的舆论质疑中国和平发展承诺的可信度,而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引导国际舆论,进一步压制中国的合理主张。日本在海洋领域的政策主张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日本作为海洋强国,如果在美国主导下深度参与印度洋—西太平洋事务,将对中国军力发展起到明显的牵制作用。

总体来看,日本并不像一部分中国人想象的那样正在或已经衰落。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如果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甚至爆发军事冲突与战争,在上述国际因素的影响下,中日力量对比可能出现诸多变数,两败俱伤是较可能出现的前景。

¹ 《英媒:日本悄然“潜回”南海 拉拢菲越对抗中国》,参考消息网,2015年3月12日, <http://mil.cankaoxiaoxi.com/2015/0312/700758.shtml>, 2015年4月2日登录。

二、如何认识日本战略走向

关于日本战略走向，国内有普遍影响力的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企图走老路、恢复军国主义，正在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安全威胁，未来“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须全力打压日本。这种观点忽视了冷战后军事在解决国家间争端中作用下降，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GDP的比重呈现缓慢下降态势等事实。¹此外，按照这种观点的推论，中国应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遏制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严格地说，中外学界对“军国主义”的定义是有一定共识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蒋立峰认为，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²在西方语境中，“军国主义”的最初含义是军事部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早期的含义则是整个社会的军事化，并且怀有征服世界的野心。³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对内全面扼杀民主、法西斯军人当政，对外侵略扩张、进行殖民统治的道路。因此，问题的焦点在于，目前的日本政府是否怀有侵略扩张、征服世界的野心，且对外决策由军事集团所主导？

尽管国际舆论在此问题上与中国的看法差别甚大，但鉴于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加上长期以来日本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反反复复，的确让人难以放心。不过，研判一国的战略走向，需要结合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以考察，同时对领导层以及可能产生破坏力的群体加以分析。大体来讲，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不会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其主要依据为四个基本判断。

第一，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的趋势在中长期内将继续发展，但国内国际环境的发展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仍具有很强的约束。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革新势力遭到严重削弱，日本政治日益右倾保守化，这一发展趋势在中长期内将难以改变。但是，这种政治状况与日本历史上曾出现的军人操控国政、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仍有本质区别。当前，从国际环境看，包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现代战争形态的变化、日本经济与他国的高度相互依赖、日本融入国际制度的深度、中国的强大以及美国的政治军事控制等，都将使日本主动发动对外战争的收益最小

1 Azar Gat, "Is War Declining—and Wh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0, No.2, 2013, pp.149-157; Mark Harrison and Nikolaus Wolf, "The Frequency of War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65, No.3, 2012, pp.1055-1076.

2 蒋立峰：《关于日本军国主义》，载《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北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5年，引文见第206页。

3 Albert T. Lauterbach, "Militarism in the Western World: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5, No.4 (Oct., 1944), pp.446-478.

化、风险最大化；从收益成本角度看，日本的政治精英如果选择对外侵略，结果必将是惨败；从国内环境看，战后日本的民主制度建设、国内和平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日趋严峻的高龄少子化社会问题，以及严峻的财政负担等，客观上也都难以为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提供支撑。

第二，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实现“国家正常化”的趋势正在加速发展，并已得到除中国和韩国等几个国家以外的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但我们也要认识到，日本民众与日本的最大外部倚靠美国对此问题也仍保有警惕性。日本借“正常化”之名、偷偷行侵略扩张道路的难度很大。虽然日本民众目前总体上支持“国家正常化”，但半数以上的人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持反对或担心态度，最近日本国内各界民众爆发的反对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的浪潮即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据日本内阁府2015年3月7日公布的一份舆论调查，目前关心自卫队和防卫问题的人创1978年设置这一提问以来的最高值。其中，29.9%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当增强”防卫能力，几乎两倍于2009年，但是59.1%的日本民众仍然认为自卫队保持现有防卫能力即可。¹ 在克林顿时期任职于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杰米·梅尔茨（Jamie Metzl）最近撰文，认为战后日本在联合国和多边国际组织中提供的援助堪称表率，一个正常化的日本有助于提高地区安全，特别是在平衡中国的单边行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日本欲达到此目的，必先妥善处理历史问题。²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与日本这个盟友之间的主要分歧点是历史认识问题，美国对此也有一定的戒备心理。正如梅尔茨在评论中提到的，美国的教科书对日本的侵略和慰安妇问题写得很明白，日本领导人难以否认这类罪行。

第三，安倍政权的对外政策代表了日本政府目前的看法，但并不能完全概括日本的民意。毫无疑问，安倍是一个具有浓厚右倾色彩的政治家，然而，他身上既有来自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基因”，也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一面，其执政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不能不考虑国内不同群体的接受度。安倍执政后一度获得较高的支持率并可能较长期执政，但这并非因为他推动修宪和美化侵略历史。民意测验表明，每当他在这些方面采取行动时，其支持率就有所下降。2014年12月14日，安倍政权赢得了众议院选举，但据日本共同社完成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55.1%的日本民众不支持安倍的安保政策，同时多数人也不看好安倍经济学的效

1 《近六成日本民众望自卫队保持现状》，新华网，2015年3月9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09/c_127557338.htm，2015年4月2日登录。

2 Jamie Metzl, “Japan’s Sensitive Military Normalization,” www.project-syndicate.org, March 4, 2015,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apan-military-normalization-by-jamie-f--metzl-2015-03>, 2015-04-02日。

果。¹ 据日本 NHK 于 2015 年 3 月 9 日公布的一次舆论调查，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下跌 8 个百分点至 46%，且 53% 以上的受访民众表示没有感觉到“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景气恢复。² 7 月份安倍内阁推动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导致安倍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根据《日本经济新闻》8 月初的民调结果，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已下降至 38%。³ 安倍执政地位的延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形势使然，经历了 20 年经济萧条和 2011 年大地震的日本，需要一位强势领导人带领日本社会走出二战以来的最大困境。安倍本人也认识到这一历史性的挑战，并一直表示中日关系十分重要，希望发展两国“战略互惠关系”。

第四，日本确实有一小撮完全否认并美化侵略历史的极右势力，但他们得不到日本广大民众的支持，在国际上也十分孤立。这些人既反华，也反对美国，钓鱼岛危机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就是其代表人物之一。在当前这个时代，这一小撮严重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难以左右日本政局。对于这些人，中国要做最坚决的斗争，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因为一小撮人，而影响到对日本民众、包括各界精英的看法。

从其发展趋势看，国家“正常化”是国内民意和政治精英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走军国主义老路。

总之，日本仍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国。从其发展趋势看，国家“正常化”是国内民意和政治精英的最大公约数，而不是走军国主义老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发展军备还是有限的，难以成为我国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重视日本。日本一直非常善于利用国际形势的风云突变，政策方向有时可能发生 180 度转弯。如其实现国家正常化后决心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将可能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重大伤害；而如果日本能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则将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与中国的发展。此外，正如当年英国失去霸权地位后仍然有力支持美国谋求世界霸权地位，日本即便衰落也可能继续在较长时期内发挥其特殊作用。有鉴于此，中国必须从全局和长远战略利益考虑，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安全关系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5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强调的，“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唇齿相依。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

1 “55% Do Not Support Abe’s Security Policies, Poll Shows,” *The Japan Times*, Dec 17 2014,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12/17/national/politics-diplomacy/55-do-not-support-abes-security-policies-poll-shows/#.VR5cMtKl-hg>, 2015-04-02.

2 冯武勇、刘秀玲：《安倍支持率明显下滑》，环球网，2015 年 3 月 11 日，<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3/5875437.html>，2015 年 4 月 2 日登录。

3 《支持率出现黄色预警，安倍政权隐现变天危机》，新华网，2015 年 8 月 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8/08/c_128106568.htm，2015 年 8 月 9 日登录。

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¹ 中国提出在亚洲建立命运共同体，为此需要全面、客观、准确地判断日本的战略地位，深入认识历史问题在日本战略走向上的作用，确定切实可行、有利于长远与全局的对日政策目标。

三、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关系

2014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并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维护国家长治久安。² 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需要稳定、改善与发展中日关系。

自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的实力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显著变革，中日双方都在适应这种新的国际秩序变革进程。有学者认为，“中日双方都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和战略，对中国而言，迟早总是要给出一个对日根本态度宣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中国能接受的一个‘正常国家’？同时，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和伟大的中国？”³ 日本曾长达70年处于美国霸权的控制下，需要调整和适应的幅度远比中国大。日本选择走向“正常化”、“重振日本”，中国处于十分关键的地位。同样，中国选择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需要理性考虑对日政策。

从中国的战略目标来看，中日关系的定位要置于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框架下，这一框架包括了2014年11月初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中的“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此框架下，中国应客观评估日本对中国和平发展与亚洲崛起的作用。作为地区内首屈一指的大国，中国应主动调整，帮助走向国家“正常化”的日本牢固树立对华友好合作、成为推动亚洲共同发展的伙伴这一基本思路。

从双边关系看，中日是邻国、亚洲两个主要大国、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双方在经贸合作和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有重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周边关系和大国关系之一。历史经验表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损”。稳定与改善中日关系，对两国发展经济、保持增长，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看，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中美日三国关系是一盘

1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5年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27632463.htm，2015年4月2日登录。

2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14年1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2015年4月2日登录。

3 时殷弘：《中国在对日关系中需要调整思维方式和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

棋，对各方利益及地区和平与安全均具有重大影响。当前，中美共同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美日同盟加强的情况下，如果中日走向对抗，这一探索几无成功的可能。更进一步而言，如果日本不断向美国靠拢，全面扩充军备对抗中国，中美日三边互动就变成了中国对抗美日同盟，这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应致力于培育合作为主、稳定发展、良性互动的中美日三边关系。

从东亚安全环境看，东亚是我国周边环境中最重要地区，是我国国运之所系。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与东亚地区的总体和平、繁荣密不可分。中日交恶将使东亚安全环境日趋动荡，东亚经济一体化步伐放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从经济上疏离中国、向美国靠拢，最典型的体现是其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 TPP 谈判。有研究表明，中日两国是东亚生产分工型经济体系的两大核心驱动力，日本是迄今为止除香港地区外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技术来源国，中日经济关系仍具有相互依存、互惠共赢的显著特征。¹ 日本如再度被纳入美国主导的新型贸易投资体系，而 10+3 经济一体化进程却因中日交恶而止步，决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看，中国要走出一条新路，打破历史上崛起国和既有大国以战争手段对抗的历史循环。目前，中日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两国间的摩擦迅速上升。如果说能否稳妥处理对美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必须闯过的一道关，那么处理好对日关系则是中国要首先跨过的一道坎儿。能否改变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和平发展的大局。

当前，中国正着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目标高远，布局宏大。尽管日本和美国还没有申请参加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全球经济低迷局势、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中国构建地区发展的能力和视野有很大提升，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信心得到进一步增强。日本国内民众和工商界也在积极讨论如何从

中日双方要从全球角度，将国际秩序变革、地区政经新环境以及国家利益调整纳入到亚洲命运共同体新框架中，推动构建中日新型关系。

“一带一路”中获益。鉴于日本经济的实力以及在亚洲的长期经营历史，中日在新地区框架内加强经济合作、合力管控地区安全风险，符合双方的战略目标。

中日双方要从全球角度，将国际秩序变革、地区政经新环境以及国家利益调整纳入到亚洲命运共同体新框架中，推动构建中日新型关系。中日新型关系建设应以“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指导方针，其目标至少包括：一、有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争端；二、相互支持共

¹ 张玉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载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版，第62—77页。

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三、通过战略互惠和战略合作，携手为亚洲振兴做出积极、重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日双方应致力于提升四个方面的合作内容：一是加强对分歧的管控，特别是危机管理；二是努力消除误解与误判；三是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的交汇；四是逐步建立与加强战略互信。

四、推进中日新型关系建设的若干建议

中日新型关系的推进需要在战略层面明确发展目标，也有必要在外交工作、敏感问题以及舆论环境塑造上下功夫。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重新明确对日基本方针政策。对日基本方针是一个整体，是指导对日工作和处理中日关系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下，中国对日工作富有成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比如，对日“两分法”、中日友好合作是亚洲和平的根本保证、“中日友好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等；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一个中国”、正视历史、和平共处和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反对霸权主义、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等；中国提出并写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发展中日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世代友好”；钓鱼岛争端爆发以来中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决断，如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与日本的错误行为作坚决斗争；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分歧与危机管控；保持战略定力、维护战略机遇期。此外，习近平主席也多次强调，处理中日关系要像老一辈领导人那样，体现出“国家责任”、“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¹

第二，明确具体政策目标，主动塑造中日关系。中国希望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华友好。随着中国实力的发展壮大，日本未来的走向将受到中国对日政策及中日双方互动的极大影响。在具体对日政策的目标设定上，中国近中期应该明确争取发展相对稳定、基本正常、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日关系，长期目标则是努力发展世代友好、相互尊重、互利双赢的中日新型关系。这样一种中期和长期目标的结合，有助于打破中日关系发展的僵局，促使两国关系趋向稳定与改善。

第三，积极争取一切力量，适当调整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应明确把对日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最大限度争取日本国内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上。这些力量包括日本期望和平发展的广大民众，长期致力于日中友好合作的友好或知华力量，对安倍错误政策有制约作用的在野党，要求保持、发展日

中日新型关系的推进需要在战略层面明确发展目标，也有必要在外交工作、敏感问题以及舆论环境塑造上下功夫。

¹ 《综述：习近平对中日关系的五次表态都说了什么？》人民网，2015年5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525/c1002-27050604-5.html>，2015年7月26日登录。

中经济关系的财经界，希望稳定与改善日中关系、发展两国新型关系的研究界人士，以及自民党及安倍政府内的知华派、理性派等。为此，必须坚持开展民间外交、地方外交和经济外交，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对日工作的好传统，在新形势下更应积极开展。此外，针对两国力量对比的新形势，在两国关系摩擦的高发期，中国还应适当调整与日本政府打交道的方式，采取并坚持“统筹全局”、“斗而不破”的方针，努力做到“该斗就斗，该谈就谈，该合作就合作”，力避被动反应，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和运筹中日关系。

第四，重点处理好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较量，中国通过开展常态化巡航、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一系列有力措施，打破了日方对钓鱼岛的长期单方控制。今后，中国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重在坚持、加强巡航和搞好危机管控，并随时间推移，争取日方接受新现实，就搁置争议与中方达成新的共识。

历史问题则完全是日本的负资产。安倍若继续在此问题上倒行逆施，不仅在国际上会十分被动，而且在国内也将遭致反对。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中国应继续对日本保持强大道义压力。2015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决定于9月3日举行阅兵。从长远看，促使日本正确认识与处理历史问题，朝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向前进，仍是中国坚定不移的努力方向。

第五，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使之从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发展为推进器，进而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日经济相互依存乃是一个事实。中日经济关系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中日同为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日本则是重要的零部件供给中心，两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具有互补关系。对中国而言，日本是迄今为止的最大外资来源国，对技术进步意义重大。两国在降低关税、推进投资、发展服务贸易、环境保护、能源安全和国民老龄化等领域的合作都具有广阔的空间。

中国目前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亚洲互联互通建设，若能与日本加强探讨，可发挥其积极作用。日本经济实力依然强大，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有独特的影响力，中日经济关系的推进有助于亚太地区的共同发展。

第六，处理好改善中日关系与保持国内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依然是中国各项工作取得进展的重要前提。要正确认识民意，注意舆论引导，始终掌握好中日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坚持正确的对日斗争策略，把握好两国关系改善的节奏。稳定与改善中日关系不仅不会影响国内稳定，而且会对保持国内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七，切实加强军事安全危机管理。当前，中日两国在东海海空域的摩擦风险很大，为防止意外事件引发军事冲突，必须把军事安全危机管理作为迫切任务落到实处。中国应继续加强在钓鱼岛已采取的各项危机管理措施，并通过磋商

对话,争取使目前双方的自我克制与默契转变为信任措施。目前双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都比较谨慎,军事力量都未进入,但双方军舰、军机在东海其他海空域却频繁遭遇,一度险象环生。双方对后者的风险必须进一步明确措施,严加防范。2015年1月12日,中日两国防务部门在东京举行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双方一致认为,海空联络机制启动运行的基本技术条件已经具备,同意尽早启动该机制,并将“海上联络机制”改为“海空联络机制”。¹6月19日,海空联络机制第五轮专家组磋商在北京顺利举行。与此同时,中国也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与日本同行开展第二轨道危机管理对话,就危机管理的原则、机制与措施向双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7月13日,以民间管道和二轨对话为基础,中日专家举行第四次“中日东海空域安全对话”。在会议文件中双方一致认为,应遵守基于职业道德航空器操作惯例避免事故和碰撞等,两国之间“建立信任措施”是确保该空域安全的有效方法。²

目前,中日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摩擦高发期,须将加强危机管理、建立双边危机管理机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落到实处。要使各有关部门明确认识危机管理的原则。危机管理须从国家利益出发而非从意识形态出发,目标是尽力维护自身利益,同时避免危机失控和引发军事冲突与战争。在危机博弈中,须追求有限的目标,采取大致对等的行动。如果一定要将对方彻底压倒,危机管理将注定失败。

第八,努力建立有利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舆论环境。当前,在国内研究界与舆论界,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发言最容易被扣上政治帽子。中国一些媒体的涉日宣传报道,充斥着民族主义和各种渲染中日冲突与军事对抗的极端论调。多年来大量粗制滥造的抗日题材电视剧虽然早已引起广大观众的不满,但对文化水平偏低的受众却影响很大,他们眼中的日本还是当年那个军国主义的日本。多少年来,国内已经基本不播放或极少播放反映当代日本情况的影视作品。这种舆论环境不利于贯彻理性务实的对日政策。

针对这类不正常的情况,应该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既要坚持宣传爱国主义、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要客观报道战后日本的发展变化;既要同日本的错误做法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要创造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舆论环境。实事求是的报道,才是更有力的舆论武器;摆脱历史的悲情,才能重建健康自信的大国心态。

实事求是的报道,才是更有力的舆论武器;摆脱历史的悲情,才能重建健康自信的大国心态。

1 《中日海上联络机制第四轮专家组磋商在东京举行》,新华网,2015年1月13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13/c157278-26375508.html>,2015年7月26日登录。

2 《中日专家为东海空域安全献策》,《参考消息》,2015年7月14日,第1版。